



## 镜中人生

潘玉毅

中午去食堂吃饭，在电梯里碰到三个戴眼镜的小后生。隔壁办公室的阿姨调侃说：“哟，三个都戴眼镜呢。”然后一群人就哄笑起来。其中一个小后生被笑得不好意思，挠着头说：“您上次不也戴了啊？”阿姨回道：“这怎么一样？你们戴的是学问，我戴的是年纪。”

这话说得真好。一样是眼镜，有人戴的是学问，有人戴的是年纪。事物的发展总是与人密切相关，因为经历不同，轨迹也就有了差别。而且，即使是同样的人生，在不同的镜片里，也会呈现不一样的状态。所以，人不能活在镜片里，而要选择一副适合的眼镜笑看人生。

说起眼镜，我的脑海里常浮现两个形象：知识分子和我的外婆。在我上小学的时候，但凡班级里有谁戴了眼镜，大家都会把他（她）戏称为“大学生”，因为在我们的概念中，只有大学生才会戴眼镜，或者说只有大学生才配戴眼镜——大学生是那个年代的稀缺资源，就像戴眼镜的人一样少。至于外婆，给我留下的印象更是深刻。记忆中，外婆穿针的时候总是戴着老花镜，蹙着眉，在光线明亮的地方把线穿过那小小的孔，然后一针一针缝着裤袜、缝着棉被，缝成了我整个童年的记忆。如今，外婆因为过度劳累，已经很难视物了，但“临行密密缝，意恐迟迟归”的画面一直停留在我脑海里。

市面上的眼镜有很多种，从形状来看，有长的，有方的，有扁的，有圆的；从功用来看，有近视眼镜，有老花眼镜，有太阳眼镜；从颜色上看，更是五花八门，应有尽有。不同的眼镜，镜片不一样，镜中的成像自然也有区别。有的是用来看远物的，有的是用来靠近物的，有的是用来遮挡阳光的。镜片不同，作用不同。我们所能做的，取长补短而已。

生活中，我们常听到有人说：“不要戴着有色眼镜看人。”其实，这话有待商榷。人是感性和理性夹杂的动物。每个人待人接物一定是戴着有色眼镜的，因为有色，所以才有爱憎之分，所以才能辨出好坏，择其善者而从之。但我们要相对公正地看待一个人、一件事，选择什么颜色很重要，而这，取决于人心，只有人心正了，做事才不会歪斜。我们须时时牢记，不要错戴了镜片，用放大镜或者显微镜放大一个人身上的优点或缺点，更不要用哈哈镜去扭曲一个人。

其实，眼镜是死物，人是活物。镜中看人生，不在眼镜，不在别人，而在我们和内心选择要走的路。“人行明镜中，鸟度屏风中。”待镜片明了，物明了，人也明了。

本版摄影 马丁 总第 5630 期  
投稿邮箱：essay@cnnb.com.cn



## 网坛风雨路

——李娜自传

70

幸好医生很善解人意，没有因为我打乱他的工作计划生气。我匆忙赶回国，当时国家队全队在山东济南训练，我飞到济南，跟队里说明我的状况：我已经休息了两个星期，可水肿一直消不下去。

我们队的领导对我的腿伤表示关心，但他们也说：无论如何，我们还是希望你打进前八。

我说：不是我不愿意打，是我真的打不了。我要能说的话，我不会跟你一直在谈这些东西。

最后对方还是妥协了，说：好，那你就弃权吧。

迫于方方面面的压力，我不能直接明着弃权，还得先在场上打场比赛走个形式。记得当时碰到的是个广东女孩，我们打了一盘，我一局都没赢。

我终于能够去德国做第三次手术了，手术时间我记得很清楚：2009年10月22日。我做的三次手术都是艾瑞克主刀。第一次手术相对大一些，因为做了韧带松懈。

我记得第一次手术费差不多一万到两万，是湖北省队出的，国家队没有出任何钱。后面两次都是我自己出的钱，因为奥运会后我单飞了。

## 难忘第一年

岑莹钧

一个人一辈子干一个行当，第一年该是最难忘的。

我21岁工作，入教书这个行当已经二十年了。二十年下来，我早已习惯了它的晨钟暮鼓。我不急也不缓，就这么走着，只是感到有些疲倦罢了。

我入行的时候，这一行很不景气。但凡有点能耐的人，下海的下海，改行的改行。而我，却逆向而行。当时，我被分配到一个小镇的偏校。在那里大家都心平气和，没见人“抢课”，也没有领导在门口“侍驾”。不早来，也不胡乱迟到。偶然有事是难免的，也不会上纲上线。说不上懒散，每年送上重点高中的也不少；但也不加班加点，似乎都悠悠然的样子。

我上新书第二课的时候，副校长来听课。我有点紧张，两课时的内容一课时上完了。他说挺好，就走了，没有“后文”。就这样，我成了我的一亩三分田的主人。我可以讲一节课的鲁迅轶事，私密的，隐晦的，都讲，口无遮拦；他们觉得好听，也不厌烦我。我把我喜欢的，都兜售给他们。我为他们刻了一卷新诗，其中有舒婷的《双桅船》、裴多菲的《我愿意是激流》、阿波利奈尔的《蜜蜡波桥》……我喜欢这些诗，也希望他们跟着我喜欢，独

乐乐不如众乐乐，我不私藏。

多年之后，有学生提起我的课，都说有趣。那些轶事，他们也记着。而凡是我正经上的，他们都忘记了。渐渐地，我很少东拉西扯了——我成了一个纯粹的语文老师了。

如今，我向学生说起那些往事，他们都神往不已。可是他们同我一样，也已身不由己。我们都被固定在一个无可奈何的位置上。比如今夜有月，我们会去海边赏月吗？但是二十年前，我们却敢。其实，也无所谓“敢”与“不敢”，那时，根本就这样的顾忌。我记得是中秋前后，学校租了五六只水泥机船，浩浩荡荡去杭州湾海边赏月——那是多么浪漫的事啊！孔子赞赏的“暮春者，春服既成，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，风乎舞雩，咏而归”，庶几近之。学生们提着凳子上船，叽叽喳喳地抢着位置。船穿行在旷野间，庄稼地的气味随风飘荡。明月初升，大如车轮，金黄金黄，与平日所见，大不一样。海风浩荡，滩涂苍茫，潮来如风，风卷海浪。师生坐在海塘上，默默享受着大自然的壮美，直到后半夜，才哈欠连天地回去。谁也没有大惊小怪，家长也不曾着急，那时，谁在乎这事呢？

现在想想，我们的胆子好大哟！

那是一个教育相对纯粹的时代，无论哪一方，都没有太强的功利心。学生还有农忙假，家长对于孩子读好书考大学，也不怎么着急。老师之间，也没有那么多评比。相比现在的精细化，那简直是天壤之别。记得有一回大考之后也想与中心校比比平均分，没有电脑，只得靠算盘。一个报分数，一个拨算盘子。加到半途，不知怎么回事，出错了。只得重来，结果到后半截又犯糊涂了。如此几番折腾下来，谁都不耐烦了，于是推倒了事。大家都说，算了算了，这么多学生，哪算得清楚啊，乱叨叨，种好稻，折腾个啥呀。如此，好坏就只成了一个感觉，至于好或差几个百分点，那就不大容易搞清楚了——其实，也是不屑为的。哪像如今，有了电脑，分数存档，只要按一下键盘，什么样的比较都能出来。

一晃二十年过去了。现在，读书已是天大的事，谁也难得安闲了。许多无用功大行其道，打着各种旗号招摇撞骗。倒也不是说回到二十年前去就万事大吉——那时也有那时的毛病，只是我们丢了太多的东西罢了。

## 乡情

龚纪斌

1999年秋，我从医学院毕业，来到临江卫生院就职。

我清楚地记得，到单位报到的那天，我是从家里骑上单车，胸怀美好憧憬，费时1个多小时，共计行程约15公里抵达目的地。习惯了时尚都市的热闹繁华，习惯了实习医院的忙碌无暇，处惯了同学年少的意气风发，眼前的场景让我倍感落寞……所谓的卫生院，就是由一幢四间二层楼及其两间平房组成。并不宽敞的庭院里错落有致地点缀着各式低矮的常青花木，过道边、房檐下，晾晒着大大小小的布单。三三两两的患者往来其间，我置身于此，竟然踌躇于何去何从。紧紧攥在手中的报到证，终于提醒我什么是现实，于是见领导，谈简历，定岗位……

两个月后，我又被安排到沿江村的医疗点。医疗点就只有四间矮矮的平房，里面昏暗的格局若不是依赖几盏日光灯的照耀，纵使艳阳晴天也是伸手难见五指。然而，让我感到十分意外的是，一位年龄和我相仿的女同事迎接了我的到来。她是护理专业，在我没来之前，她一个人要承担简单的医疗、打针、配药、收费等工作。见到我，她腼腆的脸上立马堆满了开心。乌黑浓密的长发、曼妙修长的身材、银铃般动听的说笑声……她的出现，打破了我内心积蓄已久的枯燥和烦闷，慢慢地在这四间房子组成的诊室、药房、病房施展往日所学技能，每天在默契的合作中完成每例患者的诊疗……

一个听诊器、一台血压计、一支体温表就是医疗点医生的三大法宝。在日常的工作中，我们依赖的就只有这些硬件了。村里的患者不少，我们每天就是通过详细



地询问病史、全面的检查，充分运用“望、闻、问、切”四大技能，凭借专业知识，分析诊断患者的病情，拟定处方。当时，小儿的药物种类可供选择的并不多，碰到小儿发热、咳嗽的情况，我们都是需要精确计算孩子的体重后使用不良反应相对较小的药物。如果需要输液，往往协同家人一起，采取稍带强制的手段控制住孩子的反抗和折腾，无奈于在嘈杂纷乱的啼哭声中，镇定住自己，一步一步按照无菌操作流程找到静脉、穿刺、观察……我由此从一名医生兼职了护理注射的工作，并且还一直保留着单位里穿刺六次才点滴成功的记录！如果没有家长的充分信任和殷殷鼓励，这也许是不可能的事。就如老人们的期待，尽管我们的医疗帮助是极其有限，而在他们看来，是希望、是温暖。因噎息息的老人、哮喘突发的独居老人、昏厥倒地的高龄老人……我们还是

义无反顾地最先赶到，实施人工呼吸、心肺复苏、生命判断、紧急救治，护送绿色通道。癌症晚期、褥疮患者，我们还是给予最大的尊重与支持，无论风霜雨雪乃至寒暑往来，连续上门巡诊、施治，直至终老。数年来，我们走过的乡村小道，早已从荆棘遍布的泥泞小道被修建成一条条平整的水泥路面，绵延至每个巷道、胡同。路，就在我们脚下，有时长，有时短，走走停停，形成各自的轨迹，一如我们的人生。每当疲倦歇息时，我总爱翻阅诊疗记录，发现点点滴滴之间，凝聚着的全然是工作的经验，这又何尝不是我的心路历程？

时间过得飞快，一晃十多年过去了。原先的医疗点迁建新址，成立沿江社区卫生服务站。用房面积由不足100平方米增加到230多平方米，高大、宽敞、气派、干净是居民口中常常念叨的形容词。站里原先的一位同事调离，我继续留任，另外又增加三位同事，服务团队从此初步形成。我们不仅要做好原先的基本医疗工作，还需提供健康教育、预防保健、慢病管理等公共卫生工作。

环顾同学们的发展，有的早已考入二甲医院甚至三甲医院工作，有的走上行政管理岗位，有的改行做了企业老板……青春岁月渐逝，春华秋实方显。我羡慕他们的成就，但我依旧幸福地坚守着自己的麦田。享受着春天里居民们用鲜花布置我们诊室的氛围，回味着老农捧上的鲜嫩的花生，感受着童叟妇孺赠给我的“叔叔”、“伯伯”等各种称谓……我不禁在想，当年的乡村医生期待的美好蓝图，是否正是如今这般模样？

国外的收费标准是这样的：假使一台手术应该收5000块钱，那么医生会拿大约2000，剩下的是医院和药品的费用。做第二次手术时，我刚刚单飞，经济上压力很大，艾瑞克没有要他自己的那部分手术费，我只需要付医院的钱和针剂、药品以及麻醉师的工资就可以。

虽然我们之前认识，但我们并没有熟悉到可以有“通财之义”的地步，艾瑞克是个德国人，这个德国人，很仗义——不过，艾瑞克应该不知道我们的“仗义”是什么意思。

他只说：“我希望你能回到赛场上。你属于那里。”

第三次手术后，哈纳斯照例帮我做康复训练。说起来我也是哈纳斯的老熟人了，从2007年肋骨受伤起，每隔几个月就得来麻烦他一次，一来就是两三个月。哈纳斯工作的这个地方，应该算是一个社区的体育中心，运动中心是公立的，对公众开放，很多老年人都会来这里做运动。后来艾瑞克也把工作室搬到了这里，就在运动中心四楼。2011年我法网夺冠后，哈纳斯还把我的大照片贴在墙上给大家看，上面还有我写给他的话：谢谢你帮助我成为冠军！在哈纳斯这里，我曾经见到过伟大的前辈：鲍里斯·贝克尔。2009年他在哈纳斯那里做治疗，我们曾有一面之缘。贝克尔年轻时曾拿到六个大满贯，与格拉芙并称为金童玉女，在德国很有威望。即使退役多年，他依然得到了人们的敬重和爱戴。当贝克尔开始训练时，大家都自发地安静下来，关注着他。

2011年，我拿到法网冠军后，哈纳斯在工作室挂了我

的照片，贝克尔找到哈纳斯，说希望和我打个招呼。当时我正在训练，完全不知道大名鼎鼎的前辈在外面，贝克尔没有让哈纳斯传话，说，他不想影响我训练，下次再打招呼好了。哈纳斯告诉我时我有点吃惊，我没想到一个异国的年轻运动员，会得到这么多的重视和关爱。“贝克尔”这个名字以往我们只能从电视或是报纸上看到，他对我们而言，就像是武侠小说中退隐江湖的绝世高手，我没有想到自己会引起他的关注。

2011年底，我又一次在哈纳斯的场地上见到了贝克尔，当时我正在场边玩。贝克尔说：“嗨，李娜。”

我扭过头去，立刻认出了这位传奇人物。

他问我：“你的脚怎么了？”

我们交谈了十几分钟，贝克尔虽然样子威严，人却十分亲切和蔼，那种感觉像是在和一位关心你的长辈交谈。当他听到我之后参加的比赛还有桑普拉斯、莫亚等人参加时，他说：“这么多人去，真好，代我向他们问好。”

那感觉如此神奇。贝克尔离去后，我还在激动中沉浸了很久。就跟法网结束后，纳芙拉蒂诺娃主动过来和我交谈的感觉类似。2011年中网，桑普拉斯来打表演赛，当时我也在中网，桑普拉斯走出球场时，我恰好要进去，我们在通道相遇了，他非常主动地握手致意：“你好！我是桑普拉斯，恭喜你获得法网冠军！”那一刻我有点微微的战栗，桑普拉斯是一代球王，可此刻他就站在这里，主动向我问好！

责编 胡晓新 校对 任伟